

城内城外的居民组织

—— 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城址与城市起源

裴安平

目前，考古学关于史前城址与古代城市起源的研究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将国外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与方法作为中国城址城市起源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但是，中国的城址城市起源特色独具，一方面与“区域聚落形态”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却走过了一条从血缘组织到单一民族到多民族与阶级的不断演进之路（图1）。



图1：中国城市起源路线与城内城外居民组织示意图

一、城址城市起源第一阶段

距今 6000—5000 年，在全新世气候高温多雨的推动下，人类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和聚落数量大幅增长的高潮，与此同时人地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进入了空前紧张与激烈的新时代。于是，史前最早的第一批城址应运而生。

考古发现，这一阶段城址的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1、城内城外的居民有三种组织模式。

一般而言，“聚落群”就是以聚落个体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相当部落的组织群体。其中，有一体化和普通聚落群二种类型。相互区别明显，一体化聚落群不仅以血缘为基础，还融入了实力，并在实力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前从未有的主从关系即核心与随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史无前例地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根据已有的资料，这一阶段城址所在一体化聚落群有三种组织模式。

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早期城址¹所在聚落群就是 A 型的代表，所有组织成员在空间

上都是近距离相聚的独立个体（图 2, 1）；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²所在聚落群就是 B 型的代表，所有组织成员在空间上都零距离相聚在同一个遗址中（图 2, 3）；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大溪文化晚期城址³就是 C 型的代表，二个城址连体共同组成为一个聚落群。

2、城址都是一体化聚落群即一体化部落的核心。

虽然各自组织模式不同，但城址却都是所在聚落群即部落最有实力的核心。其中，地势开阔，堆积丰富的走马岭也是核心。

3、城址都是单聚落的住所。

湖南澧县城头山，从大溪一直到屈家岭文化，城内的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之所以都具有独立而长期固定分布的特点，就说明城内只有一个聚落居住和驻守（图 2, 2）。

河南郑州西山虽然多聚落相聚在同一个遗址中，但城址不仅是核心，而且面积小，也只适合一个聚落居住（图 2, 3）。

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虽然是二座城的“连体城”，但每一座城都分别位于不同的山头上，作为独立聚落的独立性也很明显（图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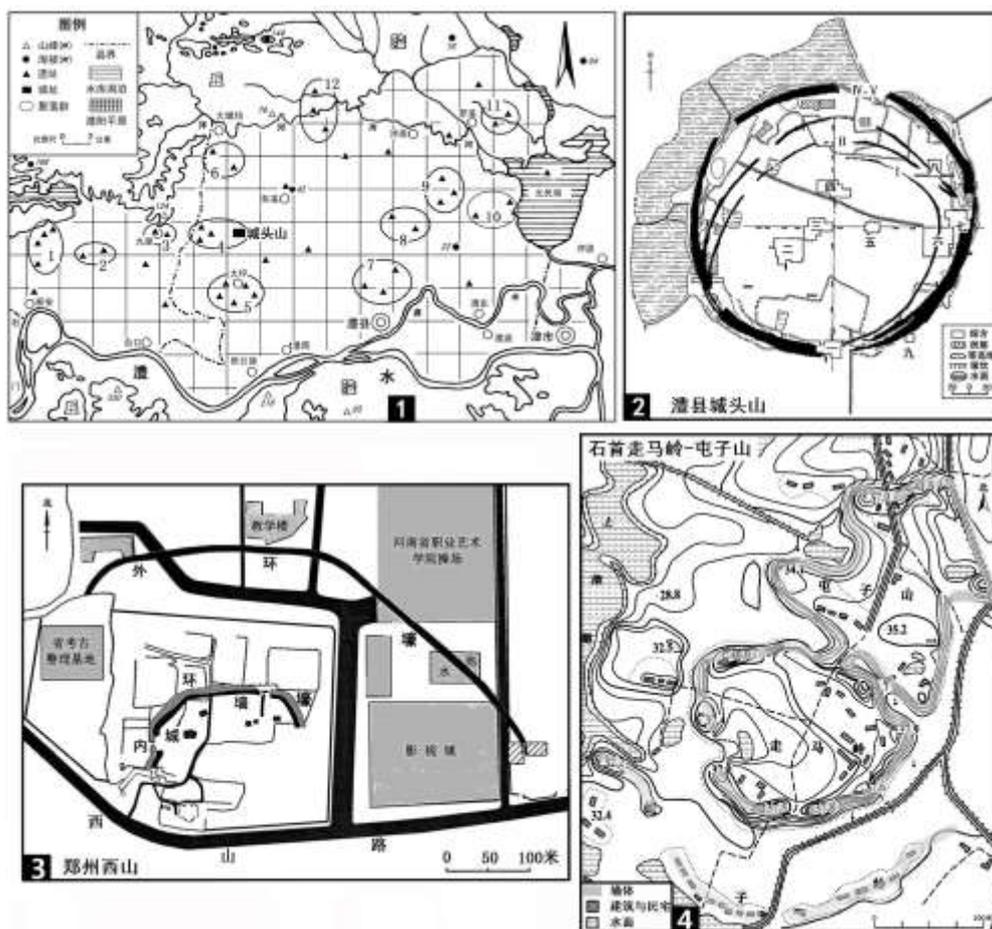


图 2：距今 5 千年以前各地城址城内城外居民组织方式与平面图

1、2、湖南澧县城头山，3、河南郑州西山，4、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

（1-4 皆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4、城址的规模都很小。

这一阶段，迄今全国总共发现 4 座城址，面积都很小。

湖南澧县城头山，8 万平方米；

湖北天门龙嘴，8.2 万平方米⁴；

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连体城），每城 8 万平方米；

河南郑州西山，3.5 万平方米。

5、城址都是聚落群的高级军事中心

由于当时所有的聚落群即部落都是纯血缘的组织，领导与管理也都是长辈说了算；所以

当时就没有出现政治组织，也没有政治中心；因而当时的城址就都是一体化血缘组织的军事中心。

又由于城址的防御功能超过了当时所有其它各种类型的聚落防御设施，如长年无积水的壕沟和长年有积水的濠沟（图 1），所以城址的存在就显示了一种实力与防御功能都更强的高级军事中心的意义。

二、城址城市起源第二阶段

距今 5000 年—夏商周时期，既是中国史前城址起源的第二阶段，也是城址成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由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以及不同时段社会组织一体化规模与模式的不同，城址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所以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三个连续发展的小段。

（一）第一小段：作为一体化聚落群团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距今 5000—4500 年，史前社会历史性地出现了新型的聚落组织——一体化聚落群团。

一般而言，以聚落群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跨部落一体化永久性的聚落血缘组织就是一体化聚落群团。其中，作为一体化群团核心的城址主要有六个特点。

1、城址所在群团有三种组织模式。

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所在屈家岭文化聚落群团⁵，A 型组织模式，大量聚落群与聚落遗址都近距离相聚在一起（图 3, 1）。

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群团⁶，B 型组织模式，所有的聚落群与聚落都相聚在同一个遗址中（图 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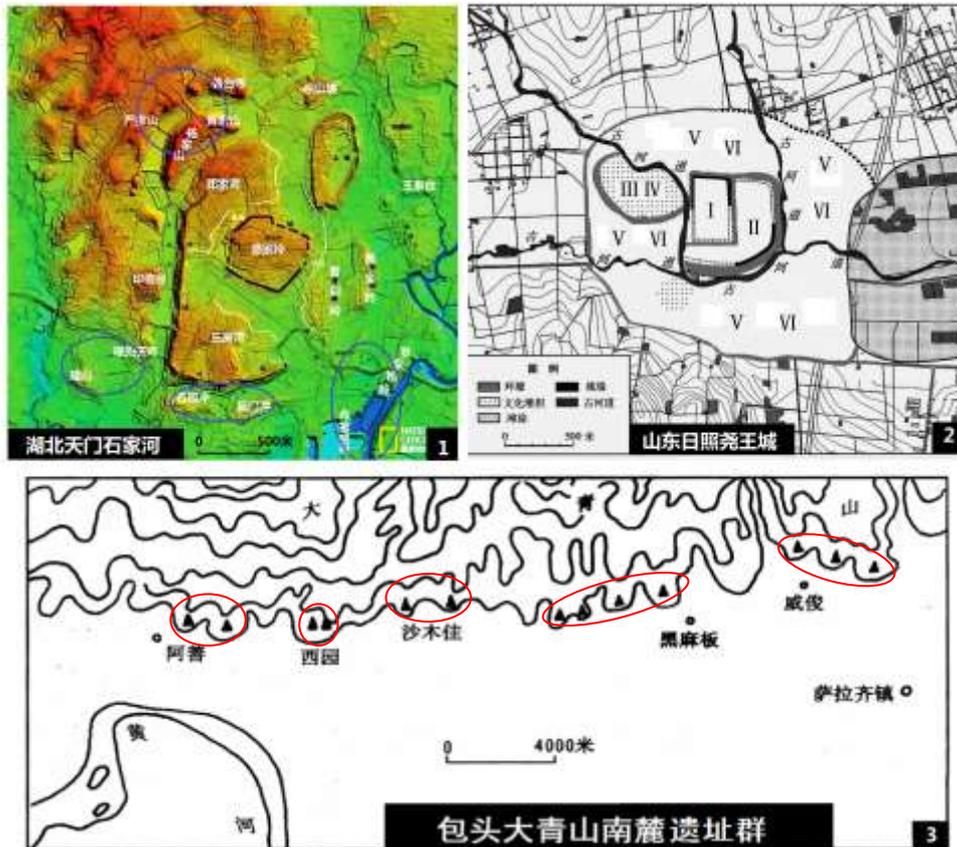


图 3：距今 5—4.5 千年各地史前聚落群团遗址分布图

（1 引自国家地理中文网，2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3 引自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内蒙包头大青山南麓威俊城址所在聚落群团⁷，C 型组织模式，所有的聚落群体呈线性近距离分布。在东西向约 20 公里的距离内集中分布有 5 个聚落群，各群距离 3—5 公里。

2、城址都是所在聚落群团的核心。

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的核心地位明显,因为所有的从属聚落群与聚落都超近距离地环绕在城址的外围。

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的核心地位更突出,因为所有的从属聚落群与聚落都零距离环绕在城址的外围。

内蒙包头的威俊,虽然位置较偏,但仍可能是这个聚落群团的核心城址,因为面积最大,约6万平方米(图3,3)。

3,出现了多聚落的城址。

距今5千年以前城址之所以面积小,皆单聚落,就因为当时最大的一体化组织也就是以聚落个体为组织单位的聚落群,核心也只能是单独的聚落个体。但是,距今5千年以后,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不仅组织单位升级了,都变成了聚落群;而且核心也升级成了核心聚落群。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城址内的居民也就从单聚落变成了2个或以上的多聚落,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聚落群。对此,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城址就是代表(图3,1)。

4,出现了核心聚落与核心聚落群共享的双城城址。

由于核心聚落群的出现,又由于核心聚落群里面还有核心聚落,所以一体化聚落群团就具有了“双核”的组织结构。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原来只有一个城圈的城址就变成了大城套小城的“双城”模式。湖北天门石家河(图3,1)、山东日照尧王城(图3,2)就都是这方面变化的典型。其中,石家河的小城位于大城之中;而尧王城的小城则位于大城一角。

5,城址的规模扩大了。

由于以前的城址只有“单核”,只有一个核心聚落,所以面积都小,8万平方左右。但距今5千年以后,随着城址“双核”结构的出现,城址的规模面积大幅增长。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这方面变化的代表。屈家岭文化早期,谭家岭始筑小城,26万平方米;屈家岭文化晚期,筑大城,120万平方米(图3,1)。

6,城址开始成为聚落血缘社会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由于距今5千年以前就没有永久性跨部落的政治组织,所以一体化聚落群团就是史前最早的政治组织。

一般而言,这种组织有三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虽然还是一种血缘组织,但各自地位的排比不再按辈分高低,而以实力为基础。

第二,永久性跨部落。

第三,集中统一领导与管理。

(二) 第二小段: 作为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距今4500年以后,由于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同时催生了三种新型的一体化聚落组织,并标志人类社会的组织纽带从血缘化开始走向地缘化。

1、作为聚落集团的核心城址

以一体化聚落群团为核心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超大型血缘聚落组织就是聚落集团,而作为集团的核心城址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 城址所在聚落集团有三种组织模式。

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文化城址所在聚落集团⁸,A型,大量聚落,近40个,以原有核心聚落群为核心超近距离聚成一团(图4,1)。

湖南澧县鸡叫城石家河城址所在聚落集团⁹,B型,以近30个聚落构成的一体化聚落群团为核心,周边环绕的聚落组织既可以是普通的聚落群,也可以是普通的聚落群团(图4,2)。

山东寿县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所在聚落集团¹⁰,C型,城址周边环绕的所有组织都是聚落群团(图4,3)。

(2) 出现了聚落群团居住和驻守的城址。

由于聚落集团的组织规模比聚落群团大,而且有的聚落集团的组织成员也多见聚落群团,所以有的核心聚落群团就成为了集团的核心。与此相适应,历史就出现了整个聚落群团居住和驻守的城址,浙江余杭良渚瓶窑古城¹¹即是代表(图4,4)。在近3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大小不一的居住类遗址17处,8个聚落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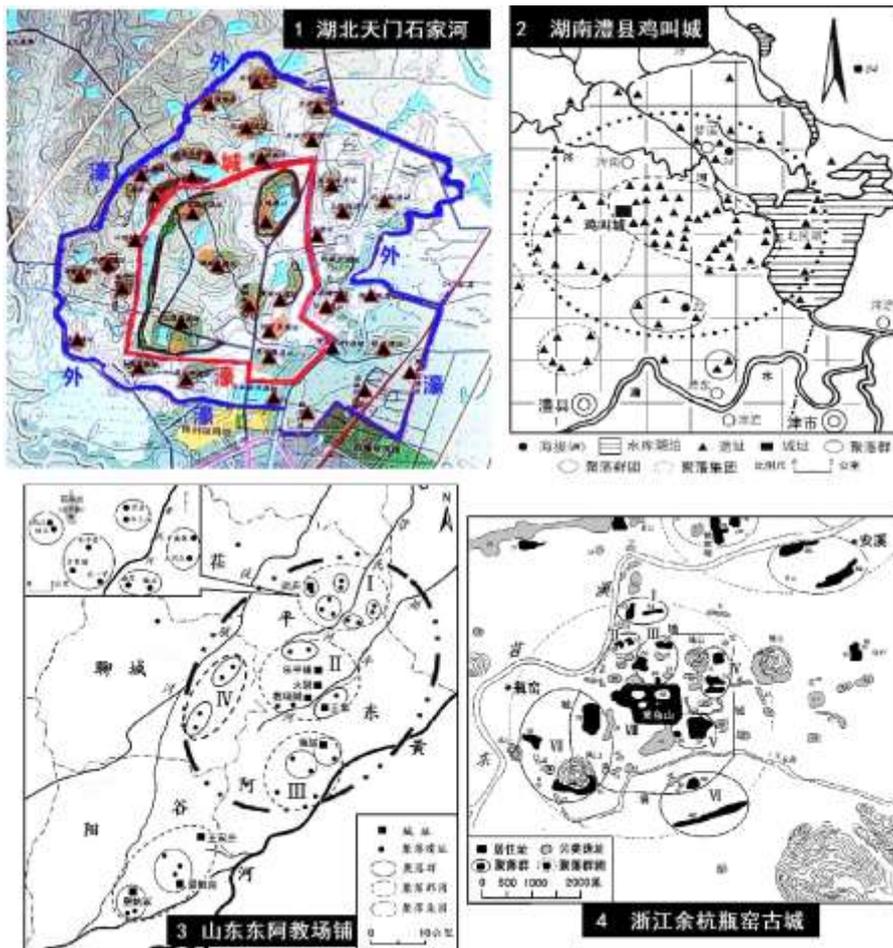


图4：距今4.5—4千年各地城址所在聚落组织群聚形态平面图

(1 引自 2018 年 12 月本文作者实地考察所摄考古工地宣传图片，2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3 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4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

(3) 出现了聚落集团共同居住和驻守的城址。

陕西神木石峁¹²就是代表。其中，东西二座城里各有一个聚落群团，仅西城目前的调查就已发现二个相距 800 米的独立的居住区，即聚落群（图 5）

2、作为早期国家的都城

一般而言，所谓“都城”就是国家及诸侯国、封国的首都，又称“京城”、“国都”。

早期国家就是血缘组织之间，或只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缘，合纵连横结盟形成的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社会组织。

有二种组织模式。

A 型早期国家：本地聚落集团+外地聚落群团，特点是跨血缘不跨地域的结盟。

B 型早期国家：本地聚落集团+近邻聚落集团，特点是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结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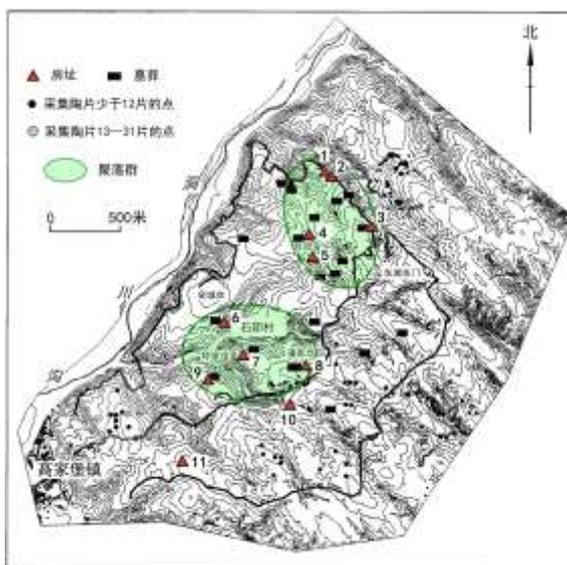


图5：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平面图
(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

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 A 型的代表（图 6,1），其中城址统领的聚落群团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聚落组织，而东南方吴刘新场一带石家河文化时期新出现的聚落组织则明显是外来的。

山东寿光青州交界处的聚落组织就是 B 型的代表（图 6,2），其中边线王城址南北二边不仅都有一个同时期的聚落集团，而且仅有 5.76 万平方米属南方集团的边线王小城址还正好位于二者之间，显示了双方以南方集团为核心结盟的良好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古国都城多数都是因为聚落组织之间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而属性升级了的城址，因而城址本身的结构和城址内外的聚落组织关系与原来相比并没有任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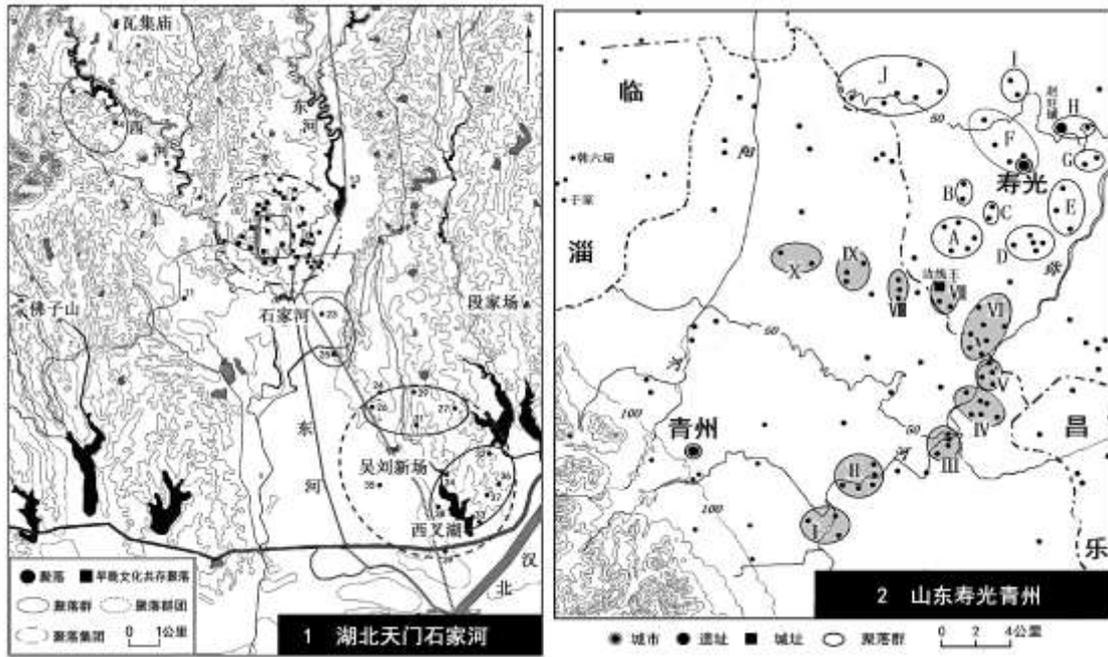


图 6：湖北天门石家河、山东寿光青州史前早期国家聚落分布平面图

（1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2 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

3、作为古国的都城

古国也是一种聚落组织，只是组织之间的关系已不同以往。它不仅又跨血缘又跨地域，还在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血缘组织，相互改变的只是一种关系，所以古国的都城与早期国家一样，都是血缘组织核心城址的自然升级，所有的建构与居民组织模式都与以往血缘组织的核心城址无异。

这种现象说明，当时社会变革的人缘基础主要依然还是血缘，变革的重点还是相互关系的调整。

（三）第三小段：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夏商周时期，有关国家的形态出现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早期“方国”。顾名思义，“方国”就是一方之国，地方之国。文献与考古表明，中国有二种方国。第一种，早期方国，可以夏商周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单一民族国家，国体地缘化政体血缘化；第二种，晚期方国，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主要诸侯国如齐、秦、楚等为代表，主要特点是多民族国家，国体政体都地缘化。

一般而言，民族是一种晚于血缘社会血缘群体和组织的新颖地缘化社会群体和组织。

民族之所以会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史前血缘社会血缘组织之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社会组织不断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组织纽带与方式不断由血缘迈向地缘的结果。

人类不同民族的区分与特点实际主要都是人的自然属性构成的。一方面是不同的自然环境

促成的结果，以致不同地区的人在外形、肤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就是地域邻近，长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以致同一地区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但是，在史前，那些人的自然特点与有关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都没有任何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因为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相应的生产生活实体完全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人们只认血缘，不认其他。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由血缘转向地缘，又随着一些古国势力的强大，以及在利益的基础上追随者日益增多，以往独立分散的自然民族开始变成一种一体化的实体民族。事实表明，夏商周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将自然民族转变为生产生活一体化的新型实体民族的代表，而且以他们为主体所建立的国家也都属于单一民族国家或早期“方国”。

根据已有的发现，中国最早的单一民族方国都具有国家主体、民族、考古学文化“三位一体”的特征与现象，国家的核心区域就是统治民族的所在区域，就是同一个自然民族的大体范围，就是由许许多多以往原本不同血缘的组织在利益的基础上构成的统治民族的所在区域，并与一定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至于被统治民族则分布在核心区的周围，还使用与统治民族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

与新的社会变化的形势相适应，夏商周时期城址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由于国家的统治范围扩大了，统治的对象也升级成了周边不同的民族，所以城址也出现了分级现象，即除了都城如河南安阳殷墟以外，还出现了类似湖北黄陂盘龙城一类地方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第二，由于当时单一民族国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体地缘化政体血缘化，如西周“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就是最好的证明，以致国家所有的城址都属于统治民族的核心血缘族体，即核心聚落集团及其“亲戚”。

第三，由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所以夏商周时期一些著名的都城都没有高大的城墙，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宝鸡周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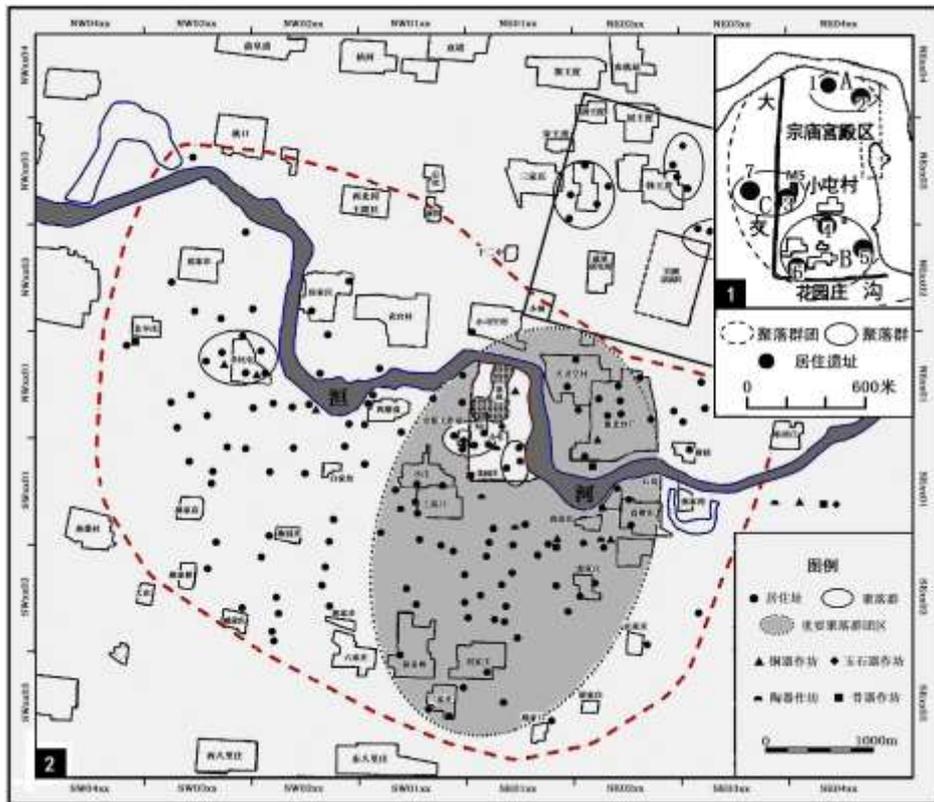


图 7：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聚落分布平面图

1、小屯大灰沟以内宫殿宗庙区的聚落群分布图，2、殷墟所有聚落分布位置图

(1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2 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第四，都城的规模扩大了。其中，殷墟，位于小屯村周围，面积 15.6—30 平方公里（图 7）¹³。

第五，都城的基本结构与史前晚期相同。

由于夏商周时期都城都是所在民族核心血缘族体的核心聚落集团，所以都城的基本结构与史前晚期并无大异。如安阳殷墟¹⁴（图7），一方面所有居民都以聚落群团为单位，即使小屯大灰沟以内，除了宫殿宗庙区以外，还住着一个核心聚落群团；另一方面地位高的群团就距离小屯最近；再一方面，城内还存在大量只为核心血缘集团和亲戚服务的“世工世族”的手工作坊。

三、城址城市起源第三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中国城址城市起源的第三阶段，也是有关都城最早从血缘化的都城变成地缘化的都城，从血缘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变成地缘化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阶段。

都城之所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出现了多民族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高潮迭起，但各诸侯国仅依靠原来授封的周民族的力量则远远不够，于是以单一民族为国家主体的政治体制被打破了，以前只有“国人”可以当兵的制度也被废除了。

春秋初期，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的同时“作州兵”，从而打破了国、野的界限，开创了“野人”也可以当兵的先例。此后，只有“国人”可以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征兵制演变。

显然，为了方国的独立与安全，也为了在各国之间争霸，从春秋开始不仅有关诸侯国都变成了多民族的国家，而且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界线与地位差别也越来越模糊。

2、国体政体都地缘化了

为了强化对各地不同民族的一体化统治，也为了防止西周分封制最终导致各诸侯国独立割据称霸的弊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始从以往的血缘化变成了地缘化。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变诸侯“分封制”为区域性的“郡县制”。

第二，变贵族“世袭制”为官僚“任命制”。

第三，兵员范围由“国人”扩大到“野人”。

第四，法制初上历史舞台。

3、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与民族隔阂都被铲除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在城里引入西周初期在基层实施的“乡里制”，并改变为“里坊制”，就是因为最终城里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单纯是统治民族核心血缘族体的现象变成多民族共存，湖北荆州楚国郢都的“下里巴人”就是血缘与民族隔阂都被铲除了的证明。当然，在“里”的周围筑起了高墙“坊”，也是为了防止各民族矛盾，防止冲突，并便于“分而治之”的有效举措。

4、出现了以独立个人为单位的阶级，阶级矛盾开始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于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政体的地缘化、生产资料使用权的个人所有、商品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法治的出现，社会也出现了新兴的不属于不代表任何民族与血缘族体的官僚、地主、富商、奴隶、个体农民。与此同时，社会也开始出现了以这些个人为单位构成的阶级。

又由于当时各主要诸侯方国基本上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民族矛盾下降了，阶级矛盾上升了，并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社会矛盾。

应该说，以个人为单位的阶级的出现和存在实际也是社会文明化、地缘化的产物与标志。

5、商品经济出现了高潮。

由于国体政体的全部地缘化，实物地租的实行，土地使用权的完全私有，这不仅解脱了劳动者被捆绑在土地上的枷锁，同时也激发了劳动者从事其他盈利职业的热情。于是，在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的高潮出现了，而商品经济高潮的出现就是这一历史性进步最好的反映与证明。

目前，考古所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如齐国燕国的刀币、三晋地区的布币、秦国及其它各国的圜钱、楚国的“蚁鼻钱”等¹，就都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高潮的最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463页。

好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以上变化促成这一时期中国城址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

1、城址开始地缘化分级。

由于社会的地缘化，城址的分级完全地缘化了，并导致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增长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河北张家口地区就调查发现城址数量多达36座，其中没有一座与血缘组织和民族有关，而全部都是当时郡县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与军事要塞¹⁵。

2、城址的规模大小开始与行政军事等级相匹配。

与史前城址的规模大小多数都与所在聚落组织实力有关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体制的地缘化，城址的大小开始与行政军事等级挂钩，等级高城则大。其中，列国都城“多在10平方公里—30平方公里之间”¹⁶。

3、城内居民的组织模式出现了“里坊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地缘化，从而导致以往单纯是统治民族核心血缘族体住地的现象变成多民族共存的场所，湖北荆州楚国郢都的“下里巴人”的存在就是证明。

4、都城成为了官营手工业的制作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最早成为“城市”的都是列国“都城”，而不是那些交通要道和物产丰富的地点，其关键原因就是都城是官营手工业的制作中心。

一方面，山东临淄齐故城的发掘就证明大量新兴的冶铸铁作坊都位于原来西周时期的城区以内（图8），显示支持新型手工业的人群就是原来统治者周民族的故人和后裔，并表明这是一种官方的特意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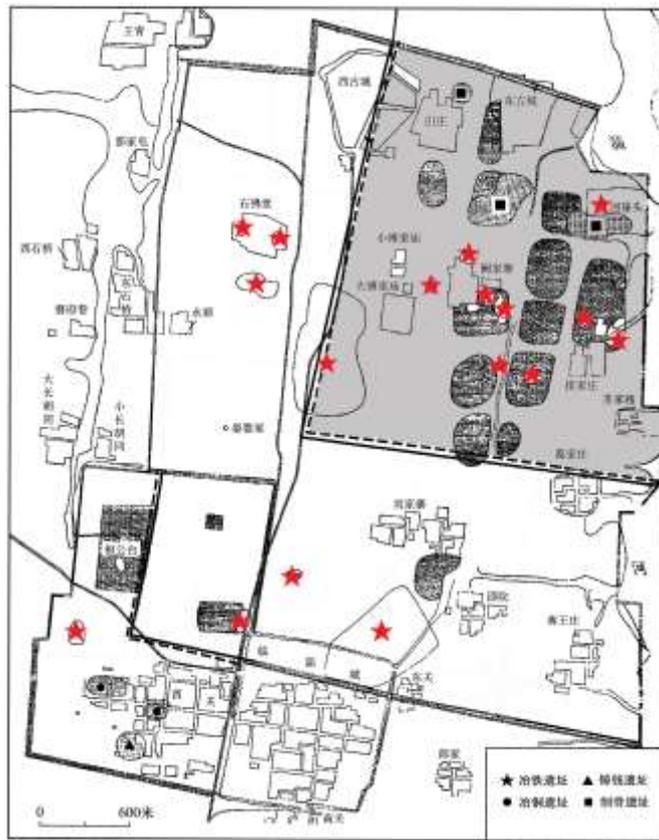


图8：山东临淄齐故城手工作坊位置分布图

图中灰色区域为西周城区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

另一方面，就是统治阶级政治与财富追求的需要。由于诸侯争霸，国家需要扩充实力；又由于地缘政治的改革，官僚的财富表面上都是固定的“酬金”；于是，官营手工业就成了统治阶级广开财源聚敛财富的一条时新之路。

5、城里出现了官营的“市”，城址变成了官营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最早成为“城市”的都是列国“都城”，而且这类都城里面都有官方划定的区域和管理机构“市”。实际上，山东临淄齐故城考古发掘所出“中市”、“右市”的陶器印文¹⁷就不仅证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存在，还证明了中国最早地缘社会的城乡分工本质是官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

6、出现了新型的“宫城”。

文献与考古都证明，由于都城已经开始成为地缘化统治与管理的治所，因此也相应地给城址的布局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在已有的“外城”与“内城”之外又新出现了“宫城”。

值得深思的是，在既有“内城”又有“外城”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要“宫城”呢？

历史表明，所谓“内城”、“外城”的本质实际都是血缘社会的产物，与统治民族核心血缘族体的分级有关。但是，战国时期，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政体不断地缘化和“郡县制”的普及，贵族的“世袭制”变为了官僚的“任命制”，国家的统治者已不再是老旧的血缘组织和“亲戚”，而是没有血缘没有民族界限的统治阶级。于是，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独立于所有血缘组织所有民族之外的属于统治阶级的“宫城”。因此，“宫城”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纯粹地缘化的统治中心与政治中心。

7、出现了“私学”。

私学就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立。

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子办学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私学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它冲破了商周以来只有贵族才有“文化”，以及“学在官府”的历史局面和传统，将教育对象扩大到了普通平民。其次，私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并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第一次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般而言，它的出现成了地缘社会所有的人独立自主地追名逐利，也同时追求自由和思想解放的阵地。

结束语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既是血缘社会的终点又是地缘社会的起点，而且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是一种历史变迁，更为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关于城址城市起源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

事实证明，中国的城址与城市起源之路特色独具。但是，如果只用从国外引进的“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研究，那这些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将全部融化并消失在晚期地缘社会之中。因此，以史前血缘组织和聚落群聚形态为平台，以城内城外的居民组织为观察城址属性和演变的平台，才是研究城址与城市起源正确和客观的方法。

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²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班：《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³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探报告》，《湖北史前城址》，科学出版社，2015年。

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龙嘴》，科学出版社，2015年。

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⁶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16年第30期。

⁷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⁸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遗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

¹⁰ 寿光县博物馆：《寿光县古遗址调查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
- 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新石器遗址调查》，《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4页；
潍坊市博物馆等：《山东昌乐县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7期。
- ¹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
 - ¹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 ¹³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展览，201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 ¹⁴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
 - ¹⁵ 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4期。
 - ¹⁶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 ¹⁷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